

双轮驱动:高校辅导员与人工智能协同 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逻辑

马燕菲,钟子林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1300)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渗透,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正面临“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的协同变革,构建辅导员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模式成为重要探索方向。二者协同的核心维度体现为AI工具理性与辅导员价值理性的适配、标准化任务与个性化引导的动态平衡、技术效率提升与思政育人本质的统一。然而,实践中存在辅导员数字素养不足、协同责任划分模糊、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脱节等梗阻。对此,需通过构建“AI+辅导员”数字素养培育体系、设计从数据感知到价值输出的协同操作链、划定技术应用边界与人文干预阈值等路径,推动网络思政教育从“技术叠加”向“深度融合”转型,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双轮驱动;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网络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作者简介]马燕菲(1997—),女,河南南阳人,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钟子林(1990—),男,广东河源人,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新型桥梁结构稳定、轨道交通工程测量、人工智能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创新团队项目“轨道交通线—桥—隧职能监测检测与安全防护技术创新团队”(项目编号:GTXYT2401)。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9006>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在高等教育场域的深度渗透,以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分析、生成式模型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展现出强大赋能潜力,不仅推动思政资源整合、个性化引导、舆情监测等环节的效能革新,更引发教育主体、中介、场景及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催生出“人机协同”的新型育人范式。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技术驱动的范式转型正深刻影响高校辅导员的工作逻辑——从知识传递的主导者向价值引领的协调者转变,从经验决策向数据赋能升级,这一转变既凸显辅导员角色重塑的紧迫性,也揭示网络思政教育生态重构的必然性,二者共同构成新时代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命题,相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关注焦点。

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趋势,人工智能对网络思政教育的技术赋能价值已形成广泛共识,但技术作为“双刃剑”的特性同样不容忽视。其在提升教育效率、拓展育人场域的同时,也潜藏着技术理性僭越教育本质、算法偏见消解价值引领、主体角色陷入异化等风险,若缺乏有效规制,可能导致技术赋能与育人目标的背离。在教育数字

化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学界已围绕人工智能与网络思政教育的融合展开多维度探索。

在技术赋能的价值与路径层面,研究普遍聚焦人工智能对网络思政教育的革新作用,认为其可通过构建智能化资源库、优化教育流程、创新互动形式等提升育人实效,为不同层次高校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同时,相关成果也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精准化育人中的具体应用,强调技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价值。这些研究为理解技术工具的赋能逻辑提供了基础视角。

针对高校辅导员这一核心主体,研究重点分析了技术环境下的角色调适与实践策略,指出辅导员需借助智能工具实现从“经验型”到“数据型”的转型,通过精准识别学生思想动态、优化工作流程提升育人针对性,同时需强化自身数字素养以避免技术应用的浅层化。此类研究凸显了辅导员在人机协同中的核心地位,为主体角色转型提供了实践指引。

在风险与边界探讨方面,学者们关注到技术应用中的双重境遇,提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教师主导地位被稀释、信息茧房加剧、伦理问题凸显等“技术僭越”现象,强调需在技术融合中坚守思政教育的

意识形态属性与育人本质;同时,研究也警示了数据隐私泄露、内容生成价值偏差等具体风险,呼吁建立“技术应用—伦理审查”的双重防线。这些成果从批判性视角为技术应用划定了边界。

在具体应用场景与实践路径层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技术与教育的融合逻辑,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政内容创新、价值引领场景化渗透中的应用可能;分析了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同质化、形式化困境,提出“技术赋能+人文升华”的破解路径;同时,也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思政教育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选择,为协同模式构建提供了框架参考。

现有研究虽已覆盖技术价值、主体角色、风险规避、实践路径等多个层面,但仍存在明显局限。多数成果或侧重技术的工具属性,或聚焦辅导员的单一主体作用,对二者“双轮驱动”的协同机制缺乏系统探讨。对协同过程中的核心维度(如功能互补、目标统一)、实践梗阻(如能力断层、责任模糊)剖析不够深入,难以支撑协同模式的落地。针对“技术工具”与“人文引领”的平衡逻辑,尚未形成可操作的规范体系。这种研究缺口使得网络思政教育在技术融入中易陷入“技术依赖”或“主体缺位”的极端,难以实现协同效能的最大化。

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双轮驱动”理念,聚焦高校辅导员与人工智能协同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逻辑,系统探究二者协同的核心维度、实践梗阻及构建路径。通过解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适配关系、标准化任务与个性化引导的平衡机制,识别辅导员数字素养不足、责任划分模糊等现实困境,最终构建“能力培育—流程优化—边界规制”的协同体系。研究旨在为推动网络思政教育从“技术叠加”向“深度融合”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式育人模式提供实践参考。

一、协同关系的核心维度

(一)AI的工具理性与辅导员的价值理性适配

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以算法逻辑为核心,指向数据处理的精准度与任务执行的高效性,在网络思政教育场域中表现为对舆情信息的快速聚类、教育资源的智能匹配及常规事务的自动化处置,形成量化的技术操作范式。高校辅导员的价值理性根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聚焦对学生思想动态的质性把握、主流价值观的深度引领及人文关怀的情境化传递,承载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技术基底,通过剥离重复性劳动释放辅导员的精力投入,使其专注于思想疏导、价值辨析等需深度人文介入的环节。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划定应用边界,通过对算法逻辑的价值校准与数据结果的意义阐释,避免技术应用陷

入唯效率论的异化陷阱。这种适配构建起工具与价值共生的生态,使技术效能始终服务于育人价值的实现。

(二)标准化任务与个性化引导的动态平衡

标准化任务构成网络思政教育的基础支撑,涵盖学生行为数据的规范化采集、思政知识体系的结构化推送及共性问题的程序化回应,依托统一操作规范与评价标准保障教育覆盖的全面性与稳定性。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为这类任务的高效完成提供可能,可实现跨平台数据的整合分析与教育资源的批量分发,夯实教育实施的“基本面”。个性化引导聚焦学生思想成长的差异性特征,针对个体心理困惑的独特成因、特殊群体的成长困境及价值冲突的情境化表现,依赖辅导员对学生个体经历与情感需求的深度共情,实现精准化干预。标准化任务为个性化引导提供数据参照与规律支撑,通过行为特征的量化分析锁定干预靶点,增强引导的靶向性;个性化引导反哺标准化任务的优化,将个案案例中提炼的共性规律注入标准体系,使规范更贴合学生实际。这种动态平衡消解了标准化导致的模式化弊端与个性化引导的碎片化局限,形成“规范为基、个性为要”的育人节奏。

(三)技术效率提升与思政育人本质的统一

技术效率提升是人工智能介入网络思政教育的直接效能,体现为教育响应速度的加快、覆盖范围的拓展及资源利用的优化,推动舆情预警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转型、教育资源从粗放供给向精准配送升级,为思政教育注入技术驱动的加速度。思政育人本质指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核心目标,强调对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感的深层培育,其成效体现为价值认同的深度与行为转化的效度。技术效率提升作为服务于育人本质的路径,通过创新教育形式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渗透力,但其效能始终以是否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为评判标尺。育人本质为技术效率提升锚定方向,通过对技术应用的价值筛选,使效率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让技术赋能最终落脚于铸魂育人的根本要求。这种统一消解技术与教育的二元对立,使效率提升始终朝着育人本质的方向进阶。

二、实践梗阻的具象表征

(一)辅导员数字素养不足与AI技术应用浅层化

辅导员数字素养的结构性缺陷构成技术协同的首要梗阻,其核心表现为技术认知的碎片化与实践应用的表层化。在认知层面,多数辅导员对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缺乏系统把握,既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等技术的底层原理,也无法准确预

判算法推荐可能引发的认知偏差,导致在技术选型时陷入“盲目跟风”或“全盘拒斥”的极端。部分辅导员将 AI 工具简单等同于“智能搜索”或“自动回复”,对其在舆情研判、行为预测等方面的潜力缺乏认知,形成“有技术无应用”的闲置状态。

在实践层面, AI 技术应用的浅层化特征尤为突出。情感分析系统仅能完成舆情的正负向分类,却无法识别“隐性负面情绪”背后的思想根源,如学生对社会热点的调侃式表达所隐含的价值困惑;个性化推荐系统局限于“兴趣匹配”的静态推送,未能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成长经历构建动态调适模型,导致推送内容与思想引导需求脱节。这种“技术悬浮”现象使得 AI 工具难以深度融入思政教育的核心环节,既无法为辅导员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撑,又因操作繁琐降低了教育者的使用意愿,最终形成“技术引进—低效应用—逐渐弃用”的恶性循环,制约了协同育人效能的释放。

(二) 协同过程中风险规避与责任划分的矛盾

协同机制运行中的风险规避倾向与责任边界模糊构成深层梗阻,其本质是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与教育责任的确定性之间的张力。在风险规避方面,人工智能的数据采集、算法决策环节潜藏多重风险:数据层面,学生的社交言论、行为轨迹等隐私信息在整合分析中存在泄露隐患,可能引发信任危机;算法层面,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模型可能固化认知偏见,如对“特殊群体”的标签化判断,导致教育公平性受损。

现有制度框架对风险责任的界定缺乏细化规范,使得协同主体陷入“避险困境”。辅导员作为直接育人者,因担忧数据滥用追责而刻意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如仅允许技术介入公开信息分析,回避对私密行为数据的挖掘;技术研发方则为降低风险,在算法设计中简化价值判断模块,导致 AI 在复杂舆情场景中“退化为”数据统计工具。责任划分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矛盾,当 AI 推送内容出现价值偏差时,难以区分是算法训练数据的意识形态疏漏,还是辅导员审核环节的失职;当舆情预警滞后时,技术工具的灵敏度不足与辅导员的响应时效滞后形成责任推诿。这种矛盾迫使协同过程转向“保守性操作”,既无法发挥 AI 在风险预判中的技术优势,又削弱了辅导员主动运用技术的积极性,使协同陷入“低风险—低效能”的锁定状态。

(三) 技术赋能与思政教育价值引领的脱节

技术赋能的工具理性与思政教育的价值理性出现功能性背离,构成协同育人的根本性梗阻。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以“效率优先”为核心,其算法设计注重数据拟合与精准匹配,却难以承载思政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价值引领功能。在内容生产环节,

AI 生成的思政素材往往呈现“去价值化”倾向,如将红色文化简化为“历史事件时间线”,剥离其蕴含的革命精神与信仰力量;在传播环节,基于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可能强化“信息茧房”效应,使学生长期局限于同质化观点,削弱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

技术应用的“替代化”倾向进一步加剧脱节。部分高校将 AI 智能问答系统视为辅导员的“全能替身”,用标准化话术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忽视个体处境的复杂性——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疏导,仅依赖预设的“励志模板”,缺乏对具体困境的共情与个性化引导。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赋能的“可视化指标”可能误导教育导向,如过度追求“资源点击量”“互动参与率”等量化数据,导致思政教育沦为“流量竞赛”,牺牲了价值引领的深度。

三、实践逻辑的构建路径

(一) 基于“AI+辅导员”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构建“AI+辅导员”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需突破传统技能培训的局限,形成覆盖认知、操作、伦理的立体化培育框架。在认知层面,需系统开展人工智能技术通识教育,通过模块化课程解析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算法推荐等技术的底层逻辑,帮助辅导员理解 AI 在舆情研判、学情分析中的应用原理,破除“技术神秘化”认知壁垒。可依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计算机学院的跨学科合作,开发“思政+AI”融合课程,将技术知识与思政教育场景结合,通过案例解析情感分析工具识别学生思想困惑的操作流程,增强认知的场景化迁移能力。

操作层面应聚焦“技术工具—教育需求”的适配训练,建立分级实践体系。初级阶段开展智能平台操作实训,利用 AI 舆情监测系统完成关键词设置、数据可视化分析等基础操作;中级阶段侧重技术创新性实践,指导辅导员运用知识图谱工具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理论—案例—实践”关联网;高级阶段则强调人机协同的策略设计,结合 AI 生成的学情报告制定个性化引导方案,培养“数据解读—教育决策”的转化能力。实训载体可采用“虚拟仿真+真实项目”双轨模式,通过模拟舆情事件演练 AI 工具的协同应用,同时嵌入校园思政工作实际项目,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完成智能画像构建,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无缝衔接。

伦理层面需强化数字伦理与意识形态安全素养培育。通过专题研讨解析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包括数据采集的边界争议、算法偏见对价值引导的干扰等,建立“技术应用—伦理审查”的思维惯性。邀请网络安全专家、思政教育学者开展跨界讲座,结合典型案例分析 AI 内容生成中的意识形态偏差,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智能推荐中的隐性渗透,培养

辅导员对技术工具的价值校准能力。同时,将数字素养纳入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设置技术应用创新指标与伦理规范指标,形成“培训—实践—考核”的闭环培育机制,确保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与规范化应用。

(二)从数据感知到价值输出的协同操作链

从数据感知到价值输出的协同操作链构建需依托“技术赋能—人文升华”的双轮驱动,形成全流程、多层级的协同机制。数据感知环节需建立多源数据整合体系,打破校园各平台的数据壁垒,将学生在学习系统、社交平台、生活服务终端的行为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动态更新的学生成长数据库。AI技术在此环节承担数据清洗、特征提取的基础功能,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思想动态的关联指标,将课堂互动频率、社会热点关注度、消费行为特征等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思想波动参数,形成初步的学情分析报告。

数据解析环节需实现AI的初步研判与辅导员的深度解读相结合。AI系统基于预设模型生成学情诊断,识别某类学生群体对职业规划的焦虑倾向,并标注关键影响因素;辅导员则结合教育经验对数据结果进行质性补充,分析焦虑背后的专业认知偏差、就业信心不足等深层原因,避免数据符号的机械化解读。此环节可建立“AI初判—辅导员复核”的双审机制,AI输出的量化指标为辅导员提供分析锚点,辅导员的人文洞察则为数据赋予教育意义,将“深夜频繁浏览就业信息”的行为数据解读为“就业压力下的心理调适需求”,实现数据理性与人文感性的互补。

价值转化环节需构建“技术建议—教育行动”的转化通道。AI基于数据解析结果生成个性化教育方案建议,针对职业焦虑学生推送行业发展报告、校友访谈视频等资源;辅导员则结合学生的个体经历、性格特征对方案进行人文调适,设计“一对一”深度访谈、朋辈分享会等场景化教育活动,将技术推荐的资源转化为情感共鸣的教育话语。价值输出的成效评估需采用“技术监测+人文反馈”的复合方式,AI追踪学生行为数据的积极变化,包括就业信息浏览时长的理性回归;辅导员则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学生思想认知的实质性提升,形成“数据改善—思想进步”的双重验证。

整个操作链需设置动态优化机制,定期召开AI技术团队与辅导员的协同研讨会,根据教育效果反馈调整算法模型与协同流程。当AI推荐的职业规划资源转化率偏低时,共同分析原因,若为资源内容与学生专业需求脱节,则优化算法的专业标签匹配精度;若为推送时机缺乏人文关怀,则由辅导员主导制定“关键节点提醒”机制,在实习季、求职季

前主动启动资源推送,确保协同操作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技术应用边界与人文干预阈值的划定

技术应用边界与人文干预阈值的划定需基于思政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技术的功能特性,构建清晰可辨、动态调整的规范体系。技术应用边界的划定应遵循“辅助性、效率性、安全性”三大原则。在任务类型上,明确AI适合承担标准化、重复性的教育辅助工作,包括思政资源的智能检索、常规问题的自动应答、舆情信息的初步筛查等,此类任务可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效率,释放辅导员的时间成本。而涉及价值判断、情感疏导、意识形态引领的核心环节,包括学生理想信念的塑造、重大舆情的引导、心理危机的干预等,则需明确为技术应用的禁区,确保教育过程的人文主导性。

在数据应用层面,需划定数据采集的伦理边界,明确学生隐私信息的保护范围,禁止采集与思政教育无关的私人通讯内容、家庭隐私数据等,建立“必要采集—最小够用”的数据使用准则。技术系统需设置数据加密与访问权限管理机制,辅导员仅能获取与教育任务直接相关的脱敏数据,包括某类学生群体的思想倾向分布,而非个体的具体行为细节,防止数据滥用对学生权益的侵害。

人文干预阈值的设定需结合教育场景的复杂性与学生思想的动态性,建立多维度的触发标准。在舆情应对中,当AI监测到负面情绪的扩散速度超过预设阈值,包括24小时内相关言论转发量突破预警线,或识别出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敏感观点时,需立即启动辅导员的人工干预程序,避免技术自动处置导致的引导失当。在个体教育中,当AI通过情感分析发现学生存在持续的负面情绪,包括连续两周抑郁倾向指标异常,或出现价值观偏差的言论,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则触发辅导员的深度访谈机制,通过面对面交流实现思想疏导,而非依赖智能系统的标准化回应。

阈值体系需保持动态调整特性,定期根据技术发展水平与教育实践需求进行优化。可成立由思政教育专家、技术伦理学者、一线辅导员组成的阈值评估委员会,结合典型案例分析阈值设定的合理性,当某类舆情因AI预警滞后导致干预被动时,需下调该类舆情的触发阈值;当个体教育中出现“过度干预”引发学生抵触时,则需细化阈值的触发条件,区分情绪波动与思想危机的本质差异。通过技术边界与人文阈值的清晰划定,实现“技术不越位、人文不缺位”的协同格局,确保网络思政教育在技术赋能中坚守育人本质。

结论

高校辅导员与人工智能协同开展网络思政教育

的“双轮驱动”模式,其核心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通过 AI 工具理性与辅导员价值理性的适配、标准化任务与个性化引导的平衡、技术效率与育人本质的统一,构建协同育人生态。实践中存在的辅导员数字素养不足、责任划分模糊、价值引领脱节等梗阻,凸显了技术应用与人文引领的张力。而基于“AI+辅导员”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从数据感知到价值输出的协同操作链、技术应用边界与人文干预阈值的划定,为破解梗阻提供了系统路径,推动网络思政教育从“技术叠加”向“深度融合”转型。这一模式始终锚定立德树人根本目标,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了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李艳芳,牛天宇.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4):18-20.
- [2]陈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3):99-101.
- [3]栗颖.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网络思政育人路径研究[N].市场信息报,2025-2-21(7).
- [4]裴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思政教育[N].新华日报,2024-5-24(13).
- [5]钟丹丹,魏艳阳.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工作的创新研究[J].高教学刊,2022,8(24):43-46.
- [6]钟丹丹,游玉栋.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路径研究[J].北京教育(德育),2021(10):87-91.
- [7]张旭,杨琼.AI 赋能与技术僭越: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双重境遇[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5(1):86-90.
- [8]于哲璎,代德伟.价值·困境·进路:人工智能赋能思政网络载体的三维[J].华章,2024(11):48-50.
- [9]邓欢,付子奥,祝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理路分析[J].红岩春秋,2025(2):109-112.
- [10]李梦圆.困境与超越: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政育人创新路径探讨[J].池州学院学报,2022,36(5):97-100.
- [11]张旭.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维度与实现路径[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22.
- [12]倪海滨.网络语言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改革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13):115-117.
- [13]周晔,张旭.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J].北京教育(高教),2021(11):47-49.

Dual-driv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llege Counsel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ng in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 Yan-fei, ZHONG Zi-lin

(Railway Engineering College, Guangzhou Railway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penet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olleg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a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umanistic guidance”. Constructing a “dual-drive” model involving college counsel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direction. The core dimensions of their collabor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e adaptation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AI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counselors,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tandardized tasks 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the unity of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exist obstacl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of counselors, ambiguous division of collabo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value guidanc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echnological superposition” to “in-depth integration” by constructing an “AI + counselor”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 designing a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chain from data perception to value output, and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thresholds for humanistic intervention. This provide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Key words: dual-drive; college counselo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